

推动跨境志愿服务 营造大湾区慈善生态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轰轰烈烈,其定位是非常高的,必将迎来各个方面的创新,而社会服务界在其中要起到一个支持和帮助的作用。

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下的跨境合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促进湾区要素便捷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发挥本区域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这也是在新时代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探寻港澳地区经济增长新动能和实现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

营造一个慈善事业的生态

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作用被形象地称为“第三次分配”,它通过弥补政府再分配能力的不足,以达到和政府一起弥补市场分配不足的目的。但慈善事业最主要的意义是能够营造出一个关爱的社会——不仅能带来一些切实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能形成社会的关爱文化。

香港是全球十大慈善地区,其九成以上的年轻人参与过公益活动,超8000家慈善组织和团体扶危济困。

对于慈善事业的管理,在香港,社会团体只要能证明慈善活动是本团体主要的活动,政府



隋玉杰/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也可以减免其经营活动的税收。而对于如何判定某一团体具有慈善团体的性质,香港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

在这里分享一下香港东华三院的案例。香港东华三院的慈善工作自创院之初就开始办理,距今已有133年历史,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华人慈善机构。与内地大型慈善组织一样,香港东华三院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也与政府的关系密切,被政府称为“合作伙伴”。但是,研究东华三院的收支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东华三院做慈善最主要的不是捐钱,而是做服务,如何去把这些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如何拓展大湾区慈善事业的生态?我们要营造一个慈善事业的生态。营造慈善事业生态需要具备四点:慈善文化、慈善意识、慈善能力和慈善环境。

首先是慈善文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消费,但是不少人生活中的消费并没有慈善文化的选项,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营造慈善方面的文化,其中要有一些传统的文化,也要吸收当下很多现代理念。

慈善意识的培养需要融入到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去,同时慈善能力也需要培养,怎么去了解人的需求并提供切实的帮助。

另外就是慈善环境。香港每到周末会有售旗日,慈善机构通过在街头售旗向市民募捐款项。但募集金额是很小的,市民捐多少都可以,主要通过这样一个形式让人人都了解我们需要去帮助别人。

社工专业资格互相认证

在社会工作的发展方面,香

港给我们启示最多的是它的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他们在慈善和志愿服务领域里面培养出来了一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可以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能够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比如评估,香港老年领域有统一的评估,统一评估能够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有需求的人群上。比如空巢老人的探视服务。其实空巢老人这一人群的异质性特别强,只有一部分老人可能是有迫切需求而需要不断关注的。我们可以用评估筛查出风险最高的老人、需求最迫切的老人,把资源用到这上面。

如何拓展大湾区社会工作机制发展空间?

一个是专业资格证书的认证。在专业资格证书方面,内地和港澳可能都不太一样,在三地不同的制度体系之下,专业资格互相认证,达成共同合作有许多的空间。

另外是实务督导人才的流动与互认、社会工作人才的联合培养。过去我们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像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香港大学跟复旦大学合作。这些合作项目培养的都是我们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界的中坚力量。

再有就是社会工作项目的多元合作。上海学习和借鉴香港

的经验,就是香港从2002年开始的“商界展关怀”计划,这个计划通过企业与社会福利界的合作建设共融社会。

跨境合作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

第一是规制距离。过去合作存在着一些规制上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域里面的一些社会政策是不一样的。

第二是规范距离,比如专业服务里面的标准制定、行业规范不一样。像汶川地震之后,关于建筑物的规范,内地和香港的不一样,所以香港在这里的援建有很多要去协调的东西。

第三是认知距离,有很多做事理念上的差异也需要去协调。

另外合作伙伴的匹配性,伙伴关系管理的机制,也是我们面临的大的课题。

费孝通教授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大湾区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培养适合本地情形的一些慈善生态,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去培养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提升我们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水平,同时又能够欣赏、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共建共享的更美好的社会。

(上接 14 版)

再次,明确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定位和作用,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组织培育模式。慈善事业发展有三大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慈善组织由政府直接进行管理运营,通过财政部门支持以及动员社会成员等方式来筹集资金;二是社会主导,慈善组织完全由民间私管部门运营,依靠平等竞争机制,通过减税和免税等方式获得政府资助,三是政府社会相结合,政府主要承担行业监管责任,也担负着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和运营环境并适当运用财政杠杆和“负向挤出效应”撬动全社会慈善捐赠的责任。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曾存在政府监管定位模糊、社会慈善组织发展在缺乏监管与过度监管之间摇摆的情况。因此,在坚持党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全面领导的同时,也要通过明确政府监管职责定位,在慈善事业中引入高效管理和竞争评价机制而尽快提高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效率。民政部门、社会组织管理部门,要主动担当作为,促进我国公益事业走向规范基础上的兴旺。

同时,加强慈善组织队伍建设,建立内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有效监督机制。慈善组织队伍建设

方面,应着重从建立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慈善组织团队,加强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提升信息公开透明水平,建立慈善资金使用跟踪反馈机制,增加善款善物流向的透明度几个方面入手,加强慈善组织内部监管。此外,健全新闻舆论、公众民意等社会力量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社会对慈善组织运作的外部监督。尤其要高度重视筹募后善款善物使用的规范透明及高效,必须有效管控黑天鹅类风险。当前这个发展阶段,我国仍有为数较多慈善资源筹募者缺乏专业化的理性分析和严格的项目管理机制,其风险容易由局部、个别的爆发而传染失控祸及全局。

最后,加快培育公益慈善文化,建设中国特色财富伦理价值体系。慈善文化和慈善理念是慈善行为的先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需要相应的社会主义财富伦理观支撑。要发扬中华民族仁爱的传统美德,让慈善成为一种先进、时尚的文化,将奉献与博爱的精神融入细节与过程中,使人们在慈善行为中获得更大更持久的精神满足;同时落实平等友善价值观,人格平等而非屈辱施舍才是现代慈善的应



有风范,内生无私的友爱共生是共享财富的信赖基石。建设现代财富伦理观的教育、弘扬与传播制度,对慈善事业长期发展起到价值支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第三次分配的内容写在《报告》的基本经济制度部分,但它与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各方面关联极为密切,特别是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是第三次分配能够得到蓬勃发展蔚然成风的关键,也会因第三次分配活跃高效而得到支持和促进。

在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我们要有不负时代不负重托的使命感,担当作为、奋发努力,使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制度机制的建立、创新、改革和完善

上,跃进一大步,迈上新台阶,让后发却更具生机的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建构起比发达国家更能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制度体系、并转化为闪耀第三次分配价值光芒的治理效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公益慈善阳光大道,有力支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